

声音

领导干部上网也是一种“微服私访”



王金山

在信息时代,网络工作至关重要,可以说是明辨是非、洞察秋毫的千里眼,是化解矛盾、维护民生的好帮手,是哪里需要哪里去的突击队,是抢时间争主动、克敌制胜的生力军。全面科学地认识网络,学会与网络打交道,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领导干部面临的重大课题。

我理解,网络首先是一个“舆论场”,在这个“场”中,谁都可以成为舆论的制造者和传播者,成为掌控舆论的主人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党委、政府的声音缺失,网络的自发舆论就会成为社会舆论的主要形式。

要学会与网络打交道。领导干部上网,也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微服私访”。在网上,我们可以听到最基层的声音,了解最真实的情况。网民所议所提虽是个人的意见,但来源于生活,出自于社会,代表着一个群体,不管是粗言、苦药,还是牢骚、怪话,只要我们带着感情、带着负责任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都能为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实践一再表明,对待网络事件,“躲”肯定不行,“堵”也不是办法,“拖”更解决不了问题,消极必然被动,积极才能主动。起码有两个方面需要引起重视:

首先,快速反应是基本要求。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阻止公众知情权的实现,往往会适得其反,甚至付出成倍的代价。因此,必须第一时间捕捉信息,第一时间站出来说话,既

全面科学地认识网络,学会与网络打交道,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领导干部面临的重大课题。网民所议所提虽是个人的意见,但来源于生活,出自于社会,代表着一个群体,不管是粗言、苦药,还是牢骚、怪话,只要我们带着感情、带着负责任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都能为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要上网看又要上网说,既不能失语又不能妄言,既需要快速又需要谨慎,“看”是为了掌握情况,“说”是为了澄清事实,对事件基本情况

的公开要快速,对事件发生原因的解析要谨慎。应当讲,多数网民是通情达理的,他们比较在乎的往往就是一种尊重和态度。其次,解决问题是最终目的。上网不是形式,更不是作秀,不仅要“上得去”,更要“下得来”。上得去是要通过上网了解情况,得到有价值的信息;下得来,是要把得到的信息进行分析研究,分清真伪,给网民一个负责任的答复,推动问题的有效解决。这是一种运用网络的能力和智慧。

网络在给我们执政党建设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用得好完全可以通过网络来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过去,我们是“支部建在连队上”,现在则要把“支部建到网络上”,也就是要运用信息技术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建工作效率。这种探索是永无止境的。

——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日前在省委督查室网上回复和省网宣办座谈会上说
本报记者 刘 杰整理



更多“声音”尽在人民网时政频道

全国首家行政审批局运转半年

九成行政许可审批被“收编”

成都武侯区 22 个政府部门的行政审批职能得到整体划转

本报成都 11 月 22 日电 (记者刘裕国)成都市武侯区行政审批局成立以来,共办结 4600 余件行政审批,比之前办结率提高了 106%;政府行政许可审批的份额,90%归于行政审批局……作为我国首个集中行使行政审批职能的“行政审批局”,这是该局成立 6 个月以来首次公开披露相关数据。

22 日,武侯区行政审批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4 月,武侯区正式成立行政审批局,将区发改局等 22 个区政府部门的行政审批职能整体划转至行政审批局,政府行政审批和监管相互分离、相互制衡,6 个月来的数据显示,实现了高效透明、方便群众的目的。

据介绍,2009 年 4 月,武侯区正式出台《武侯区行政审批新机制运行管理暂行办法》,依据中央“大部门体制”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分离的改革思路,依据行政许可法、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武侯区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行政

审批局。

在成立行政审批局前,武侯区实行政务中心“一站式”办公。但经多次调研发现,政务中心对部门各自为政的审批体制管理显得力不从心——由于窗口审批人员的权限受限,从群众手中接的大部分审批件要交回原单位逐级上报审批,影响效率不说,还常让群众跑冤枉路。同时,由于工作性质等原因,中心窗口工作人员常出现忙闲不均的状况。

“成立行政审批局,首先是充分整合了政府职能。”武侯区行政审批局局长谢存亮介绍,区发改局等 22 个区政府部门的主要行政审批职能划转至该局,被划转的审批事项共计 79 项。职能划转后,由行政审批局集中行使行政审批权,原职能部门主要承担相应的监督和管理职能,实行全新的审批与管理相分离的行政管理体制。

行政审批事项怎么管理?谢存亮说,对划转到行政审批局的行政审批事项,按照社会、经济、建设 3 个领域进行

归口整合,设置 3 个审批科,分别负责相对应审批事项的办理。按“编随事走、人随编走”的原则,工作人员主要由各行政职能部门原来派驻政务中心窗口的员工担任。现在,审批局 3 个审批科 30 余名工作人员承担了原来 22 个职能部门 90 多名工作人员所承担的审批业务。

集中行政审批权,使节约的人力资源可充实监管队伍。经济类事项审批科副科长卫爱玲,原是武侯区民政局派驻政务中心民政窗口的干部。她告诉记者,过去坐在窗口一年接办审批事项仅 100 来件,而现在一个月就要上千件。过去 3 个人干,而且多是以审代管,审批完成了事,“现在不同,审批只需一个人做,其他两人留在原来的部门做跟踪和监管。”

被“拿走”行政审批权的政府部门有哪些变化?“现在 we 不管审批了,但并没有比过去轻松。”武侯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唐凯告诉记者,“拿游泳场馆为例,我们要负责现场勘查、给审批局提供

实地资料、跟踪监管、督查商家规范运行,全区 70 多个游泳池要挨个转。”

政府部门马不停蹄地忙碌,带给群众的是快捷和方便。通过职能整合,群众原来需要跑多个部门(窗口),提交多次申请和相关材料进行办理的事项,现在只需要到一个部门(窗口),提交一次申请材料就可办理。

四川加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理徐红梅说,过去,该公司进行资质年检,要分别到政务中心窗口、武侯区房管局、房管局物业信息网报资料,然后回去耐心等待,有时一个环节的资料出了点差错,就得重走“一条龙”的报检过程,一般情况,搞一次资质年检得花掉两至三个月时间,同时还得出至少 3 名管理人员专门跑这件事。“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只需一个人把资料送到行政审批局的建设类事项审批科,第二天下午就通知我们看现场,第三天审批局干部就到公司现场办公并可当场签字,这为企业节省多少成本啊!”

退伍时圆学历梦

11 月 22 日,武警上海总队三支队一批即将退伍的老战士,展示服役期间获得的中专和大专毕业证书。

武警上海总队三支队党委以“入伍即入学,退伍前毕业”的办学模式,积极与军内外 10 余所知名院校联合办学,为战士开办“学历升级教育”,提升官兵文化素质。10 年来,共有 2 万余名官兵实现了学历升级,其中 70%的退伍战士拿到了中专以上毕业文凭。
新华社记者 陈 飞摄

· 图说新闻 ·

(上接第一版)“小伙子,你年轻,应该到基层锻炼锻炼,那里才是真正干事的地方”,便一卷行李,从县委机要室来到偏远的恰尔隆乡当乡长助理。

正是初冬季节,爬上运粮的大货车,翻越海拔 3800 米的冰达坂,怀揣壮志的师延林颠簸一天到了恰尔隆,放下行李左右转转,一下子心凉了半截。

这里比自己所能想象的更苦:想吃水,要到几公里以外的河里挑;没食堂,吃饭只能自己做或到老乡家凑合;要取暖,乡政府没有一块煤;对外联系,乡里只有一台很难转接通的摇把子电话;想看书报,几个月才能收着一次。

还有,全乡就自己一个汉族人,语言不通,无法交流,就连跟老乡要一块馍,都要比划半天。

孤单,寂寞,想念亲人;没电,缺水,生活不习惯。白天有事做还好,夜深人静时,陪伴师延林的只有一台巴掌大的“春雷”牌收音机。心里被孤独苦闷撕咬得受不了的时候,他会一个人面对空旷的山谷,敞开喉咙大吼几声。

要被这些困难压倒吗?请求老领导把自己尽快调走吗?倔强的师延林选择了“不”,挺直腰杆,直面现实。

不论 20 年前还是现在,不论在恰尔隆还是去库斯拉甫,这个自幼丧母、很小就自己赚学费、照顾弟妹的汉子认准一条死理:只要肯琢磨,办法一定比困难多。

(二)融入

“像红柳贴着大地,根才能扎得更深。”师延林明白,真正走进大山,只有俯身下去,受得艰辛

都说基层认干不认说。可到了这里的边疆山区乡,你想要“干”,还得先学会“说”。

师延林工作的三个乡,都是以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为主,恰尔隆和克孜勒陶更是典型的柯族乡。刚到恰尔隆时,粗通维语的师延林,跟这些土生土长的柯族乡民根本无法交流,更别提开展工作了。

师延林给自己定了第一个任务:先过语言关。

从此,柯族牧民的毡房里多了一个汉族干部的身影。师延林和牧民们一起啃硬邦邦的粗面馍,一起喝热腾腾的酥油茶,一起骑马骑牦牛翻达坂,走遍了恰尔隆乡的角角落落,坐遍了每一户人家的土炕,一边探民情,一边学语言。

两年多过去,师延林已经能操一口流利的柯尔克孜语和农牧民拉家常了,还喜

欢用柯尔克孜语唱动听的歌曲。《发黄的树叶》、《生活在一蓝天下》,都是他在毡房里跟牧民大哥学的。

听师延林唱歌,悠扬的旋律中能感受到苍凉的西域风情与发自肺腑的感情。不认识他的人,常误以为他就是大山里土生土长的柯尔克孜人。

大山里缺少蔬菜,杏干煮面条、酸奶疙瘩煮糊糊是牧民的家常便饭。刚开始,师延林硬着头皮往下咽。时间久了习惯了,不管吃什么,他都和牧民们吃得一样香。

渐渐地,恰尔隆的乡亲不再把师延林当外人。听他说一口标准的柯尔克孜语,看他跟自己一样黑红的脸庞,闻闻他身上毡房里的气息,当地干部和农牧民似乎忘记了,他是一名县里来的干部。

1992 年,在阿克陶县乡镇党委、政府换届选举中,农牧民不管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规定,非要选师延林当乡长,“你跟我们说一样的话,吃一样的饭,天天为我们做事,怎么就不能选?”师延林只好挨个找乡人大代表做工作,让他们选合适的柯族干部当乡长。之后,他在恰尔隆乡副乡长、党委副书记位置上工作了 7 年,1998 年被任命为乡党委书记。

在恰尔隆乡一待 14 年,师延林认识每一位村民,乡亲们也都认识他,结交的民族朋友数不清。谁家红白喜事丧事,只要通知师延林,无论多偏远的地方,他一定会去。喜庆的婚礼上,他和大家一起,伴着库姆孜(柯尔克孜族乐器)载歌载舞。今年 10 月,恰尔隆乡的吐尔地巴伊·西力普女儿出嫁,师延林还专程从库斯拉甫驱车 46 公里参加。

常年奔波在山间地头,师延林的车上、马背上总备着干馍,渴了就喝口渠沟的水,饿了就啃一口馍。有人计算过,在恰尔隆 14 年间,他走过的山路加起来有 10 万公里,“长征书记”的称呼在牧民中不脛而走。

师延林说,在山区当干部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寂寞和艰辛,要有大山一样的坚强脊梁,才能挺得住;要像红柳一样贴着大地生长,根才能扎得深。

2003 年,师延林调任克孜勒陶乡。恰尔隆的乡亲赶到乡政府,拉着他的手,依依不舍,很多人流泪。

师延林也哭了,直了。

那些连住在乡政府附近的农牧民都

不认得的“走读”干部,师延林最看不上。“待都待不住,能给乡亲们做什么事?”

农牧民们对师延林有个称呼:“看得见的书记”。

在恰尔隆的时候,乡政府离县城 200 多公里,路是季节性的。夏天常被洪水冲毁,冬天下雪封山,与世隔绝,一连两三个月不回家,对师延林是平常事。一进家门,妻子才知道他回来了;一出门,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下次回来是何时。即使路好,师延林一个月也回不了一趟家。好几个春节,都是家人上山陪他过的。

“我们乡干部,没有真正的休息日。”到库斯拉甫走马上任,师延林更感到了肩上的压力。第一件事就是必须熟悉民情。师延林下乡整整“泡”了两个月,奔波在库斯拉甫 1039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把全乡 4 个村 9 个村民小组 900 户人,家家访了个遍。

精通语言、熟悉习俗帮了师延林大忙。少数民族干部,能够清晰地知道他的意图;而他,也能掌握农牧民微妙的心态。很快,干部群众有什么想法,就都愿意找他们的“师书记”唠唠了。

乡亲们跟他念叨最多的,是住大山外走的难处。想出乡买点东西、看个病,只能搭偶尔路过的汽车,要不就步行 56 公里到最近的喀群乡坐车,辗转两三天才能到阿克陶县城,花费高还不安全,有些人一辈子都没出过大山。

乡里根本没钱通班车,怎么办?在县里的帮助下,师延林想方设法与乡里的厂矿企业协商,请他们赞助了两辆中巴车,又前前后后跑了大半年,把班车的运营手续办下来,租给乡里人经营。

“我们定好规矩,第一年交 4 万元,第二年交 3 万元,第三年交 2 万元,三年后车报废了,刚好再买一辆。”师延林想起来大大咧咧,算盘却打得精,“这样,乡里就一直有班车了,租金我们不动一分。”

到过库斯拉甫的地区知道,阿克陶是新疆最边远、最穷的地区之一,库斯拉甫又是阿克陶最边远、最穷的乡之一,“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2007 年,库斯拉甫人均收入一年只有 900 元,比阿克陶当年人均年收入 1400 多元还差了一大截。

为了让这一方百姓日子好起来,师延林坚持推广小麦、玉米良种,提高种植业收入;组织农牧民外出务工,做好劳务输出;引水进村,每 10 户就建一个集中供水点;积极联系企业,为农牧民解决冬季取暖问题和上大学的学费问题……

不到 3 年,库斯拉甫人均年收入就蹿到 1500 元,赶上了县里的平均水平。到村里看看,几乎户户有电视,家家有手机,农牧民的日子越过越滋润。

师延林最津津乐道:3 年前,乡里每天杀一只羊还卖不完。现在,每天杀一头

牦牛、4 只羊还不够卖。

干部之间、干群之间的冷漠与隔阂也在消散。每年过古尔邦节的时候,为了请汉族同志到家里做客,维族乡亲一大早就去门外守着,捧出家里最好的食物招待尊贵的客人。

每个月,师延林都带队巡查沟壑山谷。山高路遥,每次巡山回来,同去的干部、民兵都累得不愿动了,他却始终不改亲自带队的习惯。

每天,只要在乡里,师延林凌晨两点都要出门,检查几个村的民兵巡逻情况。夜深人静,家家闭户,睡梦正甜,这帮守卫大山、守卫祖国门户的人却不知疲倦。

现在的库斯拉甫,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师延林说,苦熬不如苦干,汗水不会白流。

(四)做事

听到农牧民真诚的感谢,“心再累,也会甜”

师延林每天操心的事很多。村民家的餐桌上有没有肉,双语幼儿园的孩子有没有图画书读,乡里离婚的家庭多了怎么办,甚至地里的庄稼有没有按时浇水,村民的核桃苗有没有做好过冬保暖……

为了“鼓动”乡民务工,师延林就头疼了一阵子。他与乡里的厂矿企业达成协议,要求 85%的工人必须用本地人,来提高农牧民收入。但是当地有不愿给人打工的传统,师延林只好苦口婆心地一家家劝。

慢慢地,乡民见到了实惠,最多时有 300 人在矿上干。帕米尔·排依孜就是其中一个,他今年新买了摩托车,专门上下班用。“一个月挣 1500 元,一年就是一万八!”他乐滋滋地说。

师延林掰着指头算:“一个人一万八,300 人你算算能挣多少?不说别的,前几年谁家有机车摩托就不得了,现在全乡 974 户人,已经有 600 多辆摩托车了!”

“师书记总是为我们老百姓考虑,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巴拉提·吾斯曼老人以前是恰尔隆乡的纪委书记,退休后回到老家库斯拉甫,对师延林非常了解。“他每个月的工资都是装身上的,看谁家有困难,就 300、500 地掏出去,一点都不犹豫。”

克里木·阿布杜瓦伊提家住英阿瓦提村,生活不富裕。今年 7 月,他 16 岁的女儿热依拉·克里木突发胆囊炎,急着要送医院,家里却拿不出钱。焦急的父亲跑到乡政府,师延林二话没说,从口袋掏出 1000 元。现在,热依拉已经恢复健康,再见师书记,腼腆的姑娘把一大盘子杏干都捧了出来。

一位腿有残疾的维吾尔族村民,42

岁了,好不容易找了个媳妇,打算结婚没钱,也来找师书记。师延林掏出 500 元,让他给媳妇买两身衣服,好好过日子。

“这些琐碎,小得不值一提,可是哪一件我不管都不行。”师延林常常觉得“心累”。

在很多人看来,师延林管得太宽,是自己找累。一个乡干部,在个穷地方,操这么多心干嘛?

“我就是个普通的乡党委书记,能力有限,只是凭良心做事,不想走了以后让人戳脊梁骨。”这是师延林掏心窝子的话,“等看到村民的困难解决了,生活过好了,他捧出家里最好的东西,甚至牵出一头羊非要送给我,那时真觉得欣慰,再累都值得值。”

师延林做事,不光农牧民看在眼里,干部体会更深。曾任克孜勒陶乡副乡长的汉族干部魏陇说,有时牧民有困难,师延林没带钱,其他干部就不得不垫上,“想发牢骚也不好意思,书记掏得更多!”

农牧民对师延林还有个称呼:“搬石头”的书记。山区的很多河流,冬天下水少,就像温顺的绵羊,到了夏天却格外凶猛,每年洪水都会冲毁乡里的简易公路,需要重修防洪堤、重新垫路。

从山上流下来的雪水寒得刺骨,师延林扛着几十斤的石头,趟着齐腰深的水,一天连续干十来个小时是常有的事,饿了啃口馍,渴了捧口水。村民说,没见过这样不要命的书记。

别人问师延林:“这样干,你咋想的?”师延林反问:“有啥不行的?要是你干干净净站在高处,村民会服你吗?”

(五)幸福

“为老百姓做事,被他们信赖,是更大的幸福”

幸福,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仅仅让自己的小日子幸福,还是为了让更多人幸福,师延林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

1990 年,师延林上山的时候,儿子师勇 3 岁;2009 年,儿子大学都毕业了,师延林却在更边远的山上。这 20 年,独自撑起这个小家的,是师延林的妻子,赵金香。师延林的工资总是装在身上,妻子从没要过。他记得清楚,20 年只给过妻子三次工资:一次岳母生病;一次回农场看老父亲;还有一次,是今年为妻子换掉了 5 年、修都没法修的手机。

2003 年,师延林接手克孜勒陶,发现乡里仅剩 145 块 2 毛钱。这点钱够啥?刚来又不好意思向组织伸手,他就瞒着妻子,把家里两万元存折取出来,先垫在了乡里。妻子发现存折不见了,偷偷问过师延林乡里的同事,就等着他“坦白”。结果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没动静。直到妻

子忍不住问起,师延林才承认。

面对妻子,师延林嘴上不说什么,心里总是愧疚太多。

赵金香当了 25 年的小学教师,她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几次晕倒在课堂上。以前住平房,冬天要生炉子取暖,学校每年发两吨煤。指望不上丈夫,小山一样的煤堆,是赵金香一点一点弄回家的。

师延林上山 10 年,妻子想,该回来了吧;上山 15 年,又想这下得了吧;现在上山 20 年了,妻子却说,不指望了,我拿她没办法。

2007 年,得知丈夫要去库斯拉甫,赵金香哭了三夭。日盼夜盼,结果师延林还往更边远、更艰苦的地方去,她不理解,“你不为我考虑,也该为自己的身体考虑,40 多岁的人了,一两个月难得回趟家,回县城要在路上颠簸七八个小时,你还吃得消吗?”哭也哭了,怨也怨了,妻子还是默默为师延林收拾行囊,还是有空就带着儿子上山去看他。

汉族干部杨国庆是赵金香的同学,也在乡里和师延林共事过 4 年,两家是 20 多年的朋友。他记得,2005 年 8 月,赵金香和师勇趁着暑假来乡里看师延林,正赶上克孜勒陶河发洪水,师延林带着乡干部修补防洪堤,妻儿来了也顾不上休息。儿子师勇肯不下去,也跳到水里,和大家一样憋着劲背石头补堤,忙了一整天。那年,师勇还是个高中生,18 岁。

还有一次,妻子和师延林去牧民家参加完婚礼回来,已子夜。过一座木桥时,妻子不慎坠空,掉到三四米深的水里,被冲了 30 多远处,救上来头破血流,昏迷不醒。师延林吓得魂飞魄散,现在还拍着胸脯后怕:要是出什么事,这辈子就再没有补偿机会了。

直到今天,师延林也没想过,什么时候能回县城,像其他人一样陪着妻子逛逛街、买买菜,晚饭以后散散步。他说,把这种幸福放在退休以后吧。

“我这 20 年,就是忙忙碌碌为农牧民做些琐碎的事。而且,也不只我师延林一个,周围很多人都像我一样,这么多年默默无闻地走过来,我还要什么呢?”

20 年来,师延林有过抱怨,发过牢骚,却从离不曾向组织提过,要回来。他知道,自己离不开贫穷却淳朴的乡亲,离不开贫瘠却雄伟的大山,离不开微小却值得坚守的事业。

他说:“和家人在一起是幸福,为老百姓办了好事、有了工作成绩是一种更大的幸福。你做的事越多,老百姓对你越信赖,感受到的幸福感就越强,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

这就是一名共产党人的幸福观,一个基层干部 20 年的坚守心曲。